

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

吴奎信

潮州歌册是富有潮汕地方特色的民间说唱文学,是潮汕民间艺术家的伟大创造和劳动成果,是潮汕人民和中华民族一笔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

潮州歌册有如下特点:(1)卷帙浩瀚。潮州歌册大约有五六百部,部分失传。经文革抄毁,现存200部左右,能开列书目的约300部。每部短的二三万字,长的达五六十万字,若以300部计,就有二二千万字之多。(2)流传时间久远。潮州歌册从其产生至建国初年,约有500多年,历传不衰。(3)传播面广。潮州歌册不同于文人作品,它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占领地方文化阵地,并流传至国内一些地方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与华人之中。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与甘肃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各藏有潮州歌册100多部,北京图书馆也保留一批潮州歌册。(4)独特的地方色彩。潮州歌册全部用潮汕方言写作,包容大量的俗语、民谚,不懂潮语者难以读懂,可以说,潮州歌册是“潮汕方言口语的诗歌化”。(5)妇女学习、生活的教科书。潮州歌册的基本读者是广大妇女群众,不少潮汕妇通过读唱歌册学识字,学文化,潮州歌册丰富的信息量,使固守家门的潮汕妇女大开眼界,了解社会,认识生活,知道天下事。

一个区域性的说唱文学,其数量之多,根基之深,流传之久,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为中国文学史所鲜见。

潮州歌册萌芽于明代初年。产生潮州歌册的社会历史背景是:

(1)明初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元王朝被推翻以后,朱明王朝采取了若干发展生产的措施。潮汕地区经修堤筑堤防涝,开渠垦荒和选用良种之后,农业生产有较快发展。各种金属冶炼、木雕和陶瓷新工艺等手工业生产,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造船业、渔业、盐业及海上贸易更有好势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人民大众在政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比较繁荣的形势下,产生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潮州歌册应运而生。

(2)受中原说唱文学的影响。一种文学样式的产生,有它的继承关系。宋元时期盛行于江南的说唱文学陶真、宝卷、词话等,和南戏一样,通过江西与福建两条路线,于元代以至明初流传至潮汕,潮汕的畚歌、俗曲等吸取其艺术形式和叙事特点,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潮州弹词(潮州歌册)。(3)潮汕方言大约于元末明初形成了具有独立性的地方方言。(4)儒学在明代迅速发展,对民间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潮州歌册的取材极其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古代小说和平话、各种戏曲(宋元杂剧、南戏、明代传奇、潮剧)、各种说唱文学(变文、宝卷、陶真、词话、弹词、木鱼歌)、地方民间传说、佛道故事、本地时事等。

潮州歌册的内容,有少量是来自地方民间传说或本地时事的,这类歌册或根据民间传说或时事编写,如《吴忠恕》、《海门案》等;或改编潮剧,如《陈三五娘》、《苏六娘》等。非本地题材的,大都为改编本,有的祖本单一,有的祖本复杂。前者如《再生缘》,就是改编弹词《再生缘》的。弹词《再生缘》是清代妇女陈端生写的,全篇二十卷,陈端生写至十七卷去世,由梁德绳续完。〔1〕另如《七尸八命》,写的是发生在番禺县的晚清作品,歌册明显是从木鱼歌或粤剧移植的。

但取材于传统曲艺、戏曲的潮州歌册,其题材来源则较为复

杂。如神话传说《白蛇传》，流传久远，有多个朝代多种戏曲、曲艺先后移植它。该传说始出唐志怪小说集《博异志》中的《李黄》（《太平广记》卷458），明代洪梗《清平山堂话本》卷一则有《西湖三塔记》，它是宋元艺人讲唱白蛇故事的底本。稍后编的宋元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明冯梦龙《警世通方》卷28）把过去扮美人吃人的妖怪白蛇，写为羡慕人间，大胆追求幸福生活的蛇仙，故事情节已写得十分生动曲折。明洪武郑经写了《西湖塔记》杂剧。“明嘉靖年间：杭州艺人已在弹着琵琶说唱《雷峰塔》等杭州异事”。[2]明万历年间陈六龙写了《雷峰塔》传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出版黄图必的《雷峰塔》传奇。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又出版雍正主培成写的《雷峰塔》传奇。此后又有苏州弹词《义妖传》。许多地方戏都先后把白蛇故事搬上舞台，潮州歌册《白蛇传》和《雷峰塔》，取材于哪一祖本或哪几种版本，就很难判断了。另如《白兔记》，宋元南戏、宋金诸宫调、《新编五代史平话》、锦歌（福建曲艺）、西河大鼓、二人转、弹词、各地方戏曲等均有曲有目，出不易断言哪一种是潮州歌册《白兔记》的祖本。

关于历史故事的歌册，其取材更有宽广门径：书史文传、历史演义、小说平话、各种曲艺、戏曲及民间传说等。这类歌曲，有凭借蓝本改编的，也有以下几种情况：（1）借助历史材料加以敷演，故事有史可依，情节人物大都是作者虚构的。（2）有某些历史线索可寻，人物、故事不见于史传记载。（3）人物见于传，故事情节依据民间传说或作者想像编造的。歌册《乾隆游山东》，就是借助乾隆其人编造故事的，乾隆之外的其他人物也是塑造的。潮汕先贤翁万达这一历史人物，在歌册《刘明珠》中是一位宽怀大度、明是非、讲道义的国防大臣，在《翁万达》歌册中却是气量狭窄、挟嫌报复、险辣凶残的杀人魔王。两部歌册关于翁万达的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前者贴近人物原貌，后者取材于诋毁翁万达的民间传说，从人物至事件都是

颠倒了历史真实。

潮州歌册不是历史,而是文学作品。文学是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属于历史故事的歌册,如果作者把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本质,虚构故事情节,刻划人物形象,用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历史和时代的真实,是符合文学创作原则的。但如果歪曲以至颠倒历史或人物的本质特点,那就违背历史,否定历史,是不可取的。

潮州歌册的作者,基本是下层的民间艺人或市民,他们创作的歌册是当时的文人学士不屑一顾、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低层次”作品,编歌人不愿留下姓名。但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了解人民生活疾苦,与人民思想感情相通,血肉相连,因而他们创作的歌册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为民众所接受,尤其为广大妇女所喜爱。至于像《翁万达》那样低劣的歌册,仅是少量的,这大概是编歌者缺乏明史知识,囿于民间传说的缘故。

我们说潮州歌册是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主要是潮州歌册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功能,突出表现在下列歌册内容:

1. 歌颂坚贞爱国的人物和思想行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集中表现,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独立统一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潮州歌册中属爱国主义主题或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占了大多数。包括:出征御虏,抗击外患,保卫国家民族的英雄人物;疾恶如仇,锄奸除暴,效忠国家民族的朝官;蒙冤受屈,矢志不俞,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忠臣;为民请命,秉公执法,坚持民族大义清官等等。歌册中的这类人物除见之史籍的薛仁贵、杨家将、岳飞、狄青、王昭君、包拯、海瑞、孙中山等之外,还有大批不见于史传演义,包括作者虚构塑造的朝臣、将领、地方官、勇士、豪侠以至一般平民百姓。歌册不分等级和

阶层,凡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上至大臣、下至于庶民,都受到热情的赞扬歌颂。即使迫于政局,“落草”山寨,在国家危难之际而挺身御敌救国者,歌册也毫无偏见地予以褒扬。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融合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大一统”、“天下为公”、“世界不同”,是儒家希望实现的政治理想,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发展和结晶,这在潮州歌册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2.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内涵极其丰富,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勇敢、艰苦朴素、团结互助、尊贤敬老等许多今天仍在发扬的德行或精神,都是“传统美德”。潮州歌册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时代的局限,基本是以儒家思想的道德准则作为规范加以宣扬的,按今天的观点和要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因素。儒家的道德标准“忠孝节义”像一根红线贯穿所有的潮州歌册,它是封建社会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就必须作具体分析了。

关于“忠”,歌册一般把忠于国家忠于国君统一起来,但当国君昏庸,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歌册一般不反对皇帝,赞颂贤明有德、清政廉明的国君,但对残暴虐民、荒淫昏聩的皇帝,却予以无情鞭挞和批判,直至把他推翻。这基本上反映了封建时代老百姓希望有一位明君及憎恨昏君的心态,在大多数歌册中,也许由于编造故事展开矛盾冲突的需要,皇帝普遍被人作为偏信佞臣奸妃的批判对象,这表现了潮州歌册的民主性。

潮州歌册把养亲、事亲、敬亲、尊亲作为子女对父母奉行孝道的纲纪,并有一套礼俗:结婚拜堂拜祖先、拜父母,中举升官衣锦还乡必拜谢父母祖宗,为蒙冤而死的宗亲申雪,祭吊亡灵,超度鬼魂,迁柩造墓等。宗族亲缘关系长期积淀于我国民族心理之中,孝敬父母尊长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传统美德。潮州歌册注重倡导“父慈子

孝”，不盲目宣扬“父为子纲”，对糊涂父母要儿女干坏事、错事，歌册是批判的。尤其愤恨庶母、继母虐待以至残害非亲生子女的罪恶行径。儒家思想的“孝”，虽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但也有利于建立和睦家庭，故为民众所崇奉。

潮州歌册宣扬儒家礼教的“节”，有二层含意，一是赞颂“威武不能屈”的坚持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一是倡导丧夫之妇需操守贞节。前者可取，后者显然是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是必须批判的。歌册中的刘明珠被作为孝的典范歌颂，她小时被拐卖到相府之后，被收为女儿，虽然备受宠爱，享尽华贵，但日夜思念原来父母，内心凄苦，郁郁寡欢，寝食不安。她的孝心感动了南海观世音，指引她完成世人无法做的“穿珠衫”，使蛮国俯服撤兵，为国立奇勋，功盖朝臣。但她结婚不久便不幸丧夫，她的亲生父母向她提“彩楼招婿”，她恼火了，内心责骂。后来生父又提招婿事，她一怒之下用金钟把父亲的眼角击伤流血。歌册显然把“贞操”凌驾于“孝”之上。歌册最后还写皇帝为她建节妇亭，并“御笔赠联”，可见对妇女贞节的重视。

儒家以“义”为立身之本，“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穷不失义”，“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潮州歌册以“义”作为全歌主题者属少，但“义”却渗透在所有歌册之中。歌册写了一批明义理、讲义气的朝臣官员以至代娘出嫁的义婢，为主舍命的义仆，大力褒扬一切舍生取义、大义凛然、见义勇为、仗义疏财的思想行为，贬斥忘恩负义，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丑行。

潮州歌册在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时夹带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消极、落后的因素，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的取与瑜、劣与优大都融入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歌册作者接受儒家的教育和思想熏陶，形成思维定势而表现于作品之中。

3. 宣扬行善积德和济困扶危的思想情操。封建社会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一方面,豪权贵族搜刮劫掠,残害百姓;一方面,劳苦大众寒交饥迫,遭灾受难。新兴的市民阶层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要求政治平等,并力图通过科举途径去争取政治地位。他们也反对各种勒索敲诈,希望通过刻苦自励和经营去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在道德观念方面,“市井心态的道德准则最为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决不可存害人之心……世人切忌一时糊涂,贻害终身。其次是为富不仁,也是市井心态深恶痛绝的顽症。第三是远色禁淫,是传统曲艺反映最强烈的市井道德”。[3]潮州歌册的作者处于生活的底层,与这种市井心态在感情上是共鸣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去表现市民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有部分歌册,其主题就是惩恶扬善,并把它作为“劝世文”。如《背解红罗》开头写道:“闲坐青窗无事机,只为夏天日迟迟。无物消遣心头兀,故因提起笔一支。造出一部新歌文,暂解心头之抑兀,不过劝计人行善,为人不可恶心肠。”作者开章明义点明写作动机是劝人“行善隐恶”。歌册《双如意》则说:“俗语句句无差迟,恶人自有恶人治,善人自有良善报,善恶瞒天难瞒天”。几乎所有的歌册,都有扬善惩恶的思想观念灌输其中。

潮州歌册有关扬善惩恶内容的,许多是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以及道教的神仙道化掺杂在一起。《李春风》就是一例,歌册开头叙说山东李大郎一生行善,但没有子嗣。玉皇诞辰日,众仙前来祝寿,司命报告人间善恶情况,特禀李大郎积善而绝后不公正事。玉皇令查,原来其祖宗三代犯罪积恶,祸及子孙。司命奏请应以德报德,众仙保奏,长阁仙师奏请愿投胎为子。玉皇准奏。但规定经受三次监狱磨难。长阁仙师又请求四女星降世为妻,也如奏。歌册就遵循主人公“三入狱”及与“四美妻”的悲欢离合这一思路布局,生发想象,展开情节,铺排故事。故事中土地爷、铁拐仙,为主人公李春风救灾解难。后来,李春风得中状元,一家荣华富贵,福禄寿全。全歌宣扬

的是儒家的道统思想,却通过佛道的宗教观念和形式来完成对主题思想的表现。

歌册对“行善”与“作恶”的处理,颇为严密,出较审慎。“严密”是指对善恶的报应不失漏,人间不能报,阴间报;本人不能报,子孙报。“审慎”是指报应合理适度,有分寸。歌册《刘明珠》写刘明珠的母亲王氏被相府的八个媳妇合谋所害,刘明珠得帝旨区别主谋与协从,杀死三人。但三命偿一命的惩处太过分了,三个鬼魂不服,又害死新婚的刘明珠丈夫,让刘明珠终身守寡。这大概是编歌人掌握因果报应的道德标尺吧!正如歌册经常写的:“淡淡青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祇,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4. 鞭笞奸臣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潮州歌册除写国家大事直接关联朝廷外,不属于惩恶扬善、婚姻离合、以至神仙道化等内容的歌册,也往往牵涉到封建王朝内部尖锐的矛盾斗争,而且奸臣和忠臣一开始就壁垒森严,阵线鲜明,矛盾斗争也随之而展开。这种构思和手法,颇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类似。歌册作者大概认为朝廷腐败和社会黑暗、人民遭殃,都导源于奸臣作乱,皇帝昏庸。皇帝是必须有的,“国不可无君”,这为市井心态所共识。但奸臣必须诛戮,这也是民众的心声。奸臣有何罪恶?奸臣为什么要除绝?也必须为老百姓所共识,于是,一幅由于奸臣为非作歹、祸国殃民引起的朝廷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画卷也就铺展开来了。潮州歌册的作者其实对王宫内的事情一无所知,凭借史传记载也极有限,然而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淫恶、世态的炎凉、官吏的奸诈贪婪,却历历在目。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和认识、感受,怀着愤慨感情,去揭露官僚贵族的腐败罪孽,却是入木三分。从艺术上分析,相当一部分歌册人物形象塑造得最成功的是奸臣(如《麒麟图》、《金燕媒》等)。

歌册中的奸臣,有以下几个特点:(1)大都有靠山。或者女儿是皇帝的宠妃,通过女儿向昏聩淫荡的皇帝施展美人计,欺骗蒙蔽,

使皇帝就范;或是与皇帝有亲缘关系的朝臣,皇帝之上还有其靠山。(2)收买一批党羽,千方百计的制造事端,陷害忠良,企图权柄朝纲,左右国政。(3)纵容儿子亲属,胡作非为,残害百姓,抢占民女。(4)贪财受贿,贪赃枉法,仗势凌人,做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后台。(5)在国家遭受侵略处于危难之际,或自己的罪行败露无法遁藏,末日将临,便通番卖国投敌。

歌册对于奸臣的发落,可谓从严治罪,轻则处决其本人,重则满门抄斩,即使是叛国投敌,也一个没有让逃脱。这体现歌册的基本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歌册揭露批判的虽然是奸恶朝官,但使平民百姓明辨真善美与假恶丑,故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5. 赞美科举进身和缔造美满的婚姻、家庭。潮州歌册把“勤奋读书、金榜题名”作为青年人谋求发展,创造美好未来的途径加以宣扬,而且渲染科举进身的文官武将,大部分成为济世救民的辅国栋梁并享有美满的婚姻和荣华富贵的家庭。科举考试没有门第界限,与明清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相类,带有自由竞争的形式,为市民所欢迎。科举进身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参政理想和争取政治平等的心态。明清时期,儒学在潮汕普及、发展,使一般市民有进学馆、学堂读诗书的机会,市民阶层渴慕科举及第,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正如歌册所唱:“人生只恐无才能,有才哪里袂(不会)出身。”

歌册灌注题名金榜的荣耀这一思想,但一般不写“十年寒窗”及考试中第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偶有所涉及,也必伴随其他复杂的矛盾斗争。歌册侧重写“成名”之后人物的遭遇和功业,其中婚姻遭遇往往是重点,因而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占歌册的大多数。

潮州歌册赞美才子佳人的配偶,赞美男才女貌的佳偶,但对婚姻的基本观点,则归结为“命理”和“天意”。歌册写道:“天生婚姻注定期,无缘不能做夫妻。佳人自有才子配,算来缘分无差迟”(《泰山

圣母破六奇阵》）、“天生有缘做夫妻，月老催排无差迟。自有赤绳来系足，不是姻缘不团圆。”（《海门案》）歌册写男女婚姻关系，大都未能摆脱封建礼教的规范，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荣妻贵，从一而终等，妻子也大多是男人的附庸，歌册对一夫多妻是赞美的。如《五美缘》、《五凤朝阳》都是写一夫五妻。但歌册推崇婚姻必须双方愿意，反对“强迫”夫妻；并把“结发夫妻”摆在主位，批判喜新厌旧。从下面两段歌文可见：“周公制礼定婚姻，婚姻亦着人愿心。迫招强赘何体统？举世共笑负义深”。“为人不可抛前妻，抛却前妻罪如天。常人不可如此做，何况为官步丹墀。”（《明珠记》）上述两部“一夫五妻”歌册，大都是奇缘巧合，甚至是患难夫妻，而且都是女方主动，以示男方并非好色之徒。歌册对淫荡是鄙弃的，渲染“方恶淫为首”。一切奸夫淫妇，必有恶报，下场可悲。歌册没有低级淫秽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堪入耳的描述，这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歌册写作的年代不同，反映对婚姻的观念也有所变化，越接近现代写的，其民主思想越浓厚。如《海门案》写青年妇女丹牡，其母把她许配给男方相貌极丑的一富裕人家。丹牡在其姐重病时到姐夫家照料姐姐，她羡慕姐夫的为人和一表人才。其姐死后她抗拒与父母主婚的男人同房，顶住了家庭和社会压力，与姐夫私奔，实现了自己的婚姻理想。歌册批判了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赞美了婚姻自由和缔造幸福家庭，有较强的民主性。

潮州歌册中有大量民情风俗的描述，这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

潮州歌册也有不少神仙老虎鬼的内容，这就是人们所批判的歌册的糟粕——迷信思想。绝大多数潮州歌册，或多或少都有神仙鬼魂一类的内容，而且作者基本上是以唯心论、宿命论的思想观点，来描述渲染这些东西，这就难免给歌册涂上神奇怪异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如果把凡有神仙老虎鬼的内容，一概冠以“封建迷信”之

名,恐怕就不恰当了。歌册关于神仙鬼魂的描写,主要有几种情况:(1)显灵托梦,或预兆吉凶,或点化指引。多数出现于好人中。(2)搭救受害者,帮助消灾却难。(3)被枉屈迫害而死的好人,到阴间受封神赐禄,并荫福子孙。(4)制服凶犯,惩治恶人。(5)恶鬼造次,作乱害人。

6. 在与蛮夷战斗中,出现各种妖魔鬼怪使用妖术魔法,以及神仙道佛的降妖压邪。据上所述,毋庸讳言,潮州歌册确有封建迷信的内容。但当好人遭受权恶的各种迫害,在走投无路甚至处于绝境时,得到神仙的点化救助,死里逢生,尽管这是现实中不可能有的,但它表现了济困扶危的道德理想,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希望,像这一类的内容,可以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应该指责是宣扬封建迷信思想。如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突出了梁祝爱情的坚贞不渝,“更以美丽的形象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想象”,^[4]不是迷信,而是浪漫主义方法。

在中国民间文学中,普遍渗透有神仙鬼魂一类的内容,这显然是受古代神话传说和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如《宋元话本》中,据《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的八种分类,就有“灵怪”、“神仙”、“妖术”等三类几十篇是讲妖狐鬼怪与神仙佛道的。潮州歌册中的神仙鬼魂内容,一方面是受民间文学传统的影响,一方面与潮人迷信鬼神的宗教信仰密切关连。潮汕汉人主要来自中原,聚族而居养成潮人浓厚的亲缘观念,为巩固宗族血缘关系和尽子孙的孝道,并祈求祖宗赐福,长期以来,潮人虔诚地祀奉祖宗;这使人们鬼魂存在的观念越积越深。潮人信神,则久已有之。明清时期,释道宗教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渗透,在潮汕大地扩散面广,影响也深。潮人强烈的宗教观念反映到民间文学中,是一种必然现象,也契合广大妇女读者的心态,对潮州歌册中关于神鬼内容的评析,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本文主要谈潮州歌册的思想和内容,但对潮州歌册为什么能叩开广大潮汕妇女的心扉,成为她们的精神食粮和生活、历史的教科书,有必要略加阐明。潮州歌册除了反映妇女的心态,给妇女传输丰富的信息处,其强大的艺术魅力,也是吸引妇女,打动妇女心声的重要原因。我们十分敬佩潮汕民间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高度的创造力和善于开拓的精神。每部歌册即使同一主题,但他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完全两样,每部都有独立的、全新的故事内容,而且通过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情节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每部歌册都有新颖的构思,且由于作者重视设悬念,使故事情节跌宕变化,波澜起伏,摇曳多姿。本来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潮州歌册的人物,作者都是把他推到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通过人物行动、心理活动等各种艺术手法,去揭示人物的精神境界,表现人物的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潮州歌册叙事的条理性、照应的严密性、内容的连贯性、结构的完整性,都表现出作者的经营苦心。潮州歌册全部用潮汕方言口语写作,句式整齐,双句押韵,既通俗平白,又朗朗上口,老幼皆懂,这也是它能长期扎根城乡和拥有广大妇女读者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注释:

[1]郑振铎《俗文学史》下册第3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重版本。

[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19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3]段玉明《中国市井文化与传统曲艺》第220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2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